

于省吾《诸子新证》的训诂内容

包诗林

(安徽大学 中文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诸子新证》是二十世纪“新证派”的代表人物于省吾先生的训诂专著之一,考释《管子》等十部先秦两汉时期子书中的疑文滞句共1645条。其训诂内容包括考证和校勘两个方面,同时综合运用多种版本、各种材料,对古籍文献加以重新考证,或证成旧说,或发明新义,多成一家之言。

关键词:《诸子新证》;训诂内容;考证;校勘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1-0081-05

《诸子新证》(全名《双剑谿诸子新证》)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古籍整理专家于省吾先生的训诂专著之一,全书共二十八卷,包括《管子新证》四卷、《晏子春秋新证》二卷、《墨子新证》四卷、《荀子新证》四卷、《老子新证》一卷、《庄子新证》二卷、《韩非子新证》四卷、《吕氏春秋新证》二卷、《淮南子新证》四卷、《法言新证》一卷,共计考释1645条。

于省吾先生在《诸子新证·序》(1940)中云:“诸子流别,各有师传,自师传之道中绝,而其书之幸而存于今者,又益之以篆籀分隶之演变,竹帛梨棗之逸易,注解训释之纷歧、浸假,而篇不可寻绎,词句不可属读,其高文奥义晦而不彰,由来尚矣。”^[1]至于“晦而不彰”的主要原因,不少是由于历代疏注传说而致,于先生在《荀子新证·序》中作了简单归纳:“有不知讹字而误者”、“有不识古文而误者”、“有随意增损字句而误者”、“有不知通假而误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诸子新证》考释的重点是“晦而不彰”的“高文奥义”,或证成旧说,或发明新义,进而通词句,释文意。《诸子新证》的训诂内容主要分为考证类和校勘类。

一、考证类

考证类又分两种:一是考前人之说,二是考释原文。





(一) 考前人之说

1. 证是

所谓证是,即对前人的注说加以考察,证明其正确。《诸子新证》共有证是类298例,根据证是的方式,又可分为补充证据和重新论证两种情况。

(1) 补充证据(260例)

1) 补充古文字材料

《管子新证》卷二“谗贼是舍”条:孙诒让认为“舍”当为“予”之借字。于氏按曰:“孙说是也。”并自古文字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证明,金文“余”字初作,后作,《居簠》“舍”作,魏三体石经《尚书·多士》“予其曰”,“予”古文作,亦其证也。

2) 补充古文物

《管子新证》卷二“巨瘞培”条:刘师培云:“‘培’即《说文》‘窖’字。”于氏认为刘说是也。《说文》:“窖,地室也。”朱骏声云:“今俗犹曰地窖子。”《诗·七月》“三之日纳于凌阴”,以“阴”为之,即《周礼》“凌人纳于凌室”也。最后于氏按曰:“近世所发现之商周古墓,多于地下架木为室。巨瘞培者,谓增大其瘞埋之地室也。”

3) 补充古文献

《淮南子新证》卷三“含珠鳞施”条:高诱注曰:“鳞施,玉纽也。”刘台拱云:“《续汉书·礼仪志》‘金缕玉柙’注引《汉书·旧仪》曰:‘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纽’当是‘柙’误。”于氏进一步补充曰:“《吕氏春秋·节丧》‘含珠’注:‘鳞施,玉于死者之体如鱼鳞也。’亦足以与刘说相发。”

4) 疏解句义进行补证

《荀子新证》卷二“过而通情”条:钱大昕认为“通情”应作“同情”,于氏谓钱说是也,“过而同情”,言既有过,而犹与之同情也。

5) 补充其他版本资料

《荀子新证》卷三“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条:王先谦云:“‘尽’字无义,衍文也。”于氏按曰:“王说是也。《韩诗外传》及钱氏《考异》引监本均无‘尽’字。”

收稿日期:2004-11-02

作者简介:包诗林(1967—),男,安徽舒城人,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训诂学和词汇学研究。

（2）重新论证（共38例）

前人注解的结论正确，但论证的过程不尽充分、可信，针对此类情况，《新证》一般是先列出前注，然后作进一步的论证，使人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1) 重新确立论证思路

《墨子新证》卷三“其类在鼓栗”条：曹耀湘训“鼓栗”为“战惧”，但论证不详，于氏对此作了重新论证。“鼓栗”当读作“悚慄”，“鼓”、“悚”叠韵。故“浸淫之辞，其类在悚慄”。浸淫之辞，犹《论语·颜渊》“浸润之谮”，言浸淫之辞，其类在令人战惧也。

2) 重新说明缘由

《墨子新证》卷四“多执数少”条：王念孙认为“少”当为“赏”，原因是“赏”字脱去大半，仅存“小”字，于是讹而为“小”。于省吾先生则认为“少”当作“赏”的原因并非形脱而讹，乃音近而讹，“少”、“赏”双声，并审母字。很显然，王氏猜测的成分多，而于氏则多了一层语音上的根据。

2. 驳非

所谓驳非，就是对前人的注说提出异议，并加以反驳，同时举出新的证据，进行新的论证，进而得出新的结论。《诸子新证》中的驳非类共984例，常常先列举前人之说，或言“不词”，或言“非是”，然后加“按”，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并旁征博引，言之有据，论证充分，所得结论令人信服。前注之误但从形式上看可谓纷纷总总，不过致误之由来看，主要有以下情形：

（1）不辨本字

破假借求本字，纠讹误辨正体，乃是驳非类的主体，共420例。

《荀子新证》卷二“大事已博”条：久保爱云：“‘博’疑当作‘举’。”于氏按曰：“此说非是。‘博’本应作‘尊’，即今‘敷’字，金文皆作‘尊’。”《孟子·滕文公》“举舜而敷治焉”注：“敷，治也。”大事已敷，说的就是大事已治，与下句的“大功已立”对文。有理有据，论证可信。

（2）不识古字

利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驳前人注说之误是《诸子新证》的一大特色，共72例。

《墨子新证》卷三“二临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说在寡区”条：孙诒让注“二”为“二人”，于氏按曰：“孙说非是。”《新证》认为“二”本应作“上”，甲骨文、金文“上”字均作“二”，“二”字均作“二”，从不相混，后世传写以形而讹。这样，从甲金文的角度论证形讹之由，颇具说服力，避免了主观臆测，增强了科学性，因而结论也更为可靠。

（3）不识古器物

运用古器物，特别是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文

献相互证发，是《诸子新证》的又一创新。

《晏子春秋新证》卷三“曲刃钩之直兵推之”条：苏舆引《后汉书》注“曲”为“剑”，孙星衍引《淮南子》注“推”作“摧”，刘师培也认为“推”乃误字，当从《淮南子》高注作“摧”。于氏按曰：“‘曲’不应作‘剑’，‘推’不应改‘摧’。剑乃直兵，非曲刃也，曲刃为戈戟之属，直兵谓茅剑之属，自外向内挽之曰钩，自内向外刺之曰推。……改‘推’为‘摧’是不知古兵之所由用者也。”

（4）误解词义

《管子新证》卷一“若是安治矣”条：戴望引《治要》改“安治”为“治安”。《新证》认为，《治要》妄改，不可为据。“安，焉也。……若是安治矣，即若是焉治矣。上下文均言‘治’，不言‘安治也’。”显然，《治要》误虚为实，戴氏亦不辨所以而将错就错。

（5）误断句读

《淮南子新证》卷二“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条：王念孙认为“乐”字与下文义不相属，怀疑有脱文，并援引《文子·精诚篇》“听其音则知风，观其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为据。于氏按曰：“王说非是。此应该读为‘故’句，‘乐’句，本无脱文。”《诸子新证》一共纠正句读误断者11例。

（6）误解文意

《荀子新证》卷四“邪民不从”条：王念孙云：“‘邪民’本作‘躬行’。”于氏认为王说非是，接着便从上下文的角度加以说解。上言“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此言“邪民不从”，正指百姓中之奸邪不从风者言，故曰：“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这里说的是先教而后刑。再有下文的“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而邪不胜。”也就是说教之不以其道而刑之，则“邪不胜”，这正是说奸邪之多，与前面所说的“邪民不从”之“邪”前后相应。《诸子新证》中这种直接根据上下文意而说解的共计98例，论证严密，无牵合之说。

（7）不知古代礼制

《荀子新证》卷四“成王之为叔父”条：杨倞注曰：“周公先成王薨，未宜知成王之谥，此云成王，乃后人所加耳。”于氏按曰：“注说非是。”古确有生称谥号之习。并引金文为证，“金文如成王、穆王、懿王等均生称谥号。”

（8）不知古音

《吕氏春秋新证》卷二“乃负石而沉于募水”条：高诱注曰：“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毕沅认为“募”无“伯”音，疑“募”乃“募”之讹。《新证》按曰：“毕说非是。募、伯均属唇音，又隶鱼部，乃双声叠韵字也。”

3. 释疑

释前人之疑,即既不证其是,也不驳其非,而是对前人未置可否的说解作进一步的考证,或肯定其中一说,或加以重新考证。《新证》涉及此类考释的共11例。如《墨子新证》卷二“若机辟将发也”中的“辟”字前人注解不一,司马彪注《庄子》训“辟”为“网”,王逸注《楚辞》训“机辟”为“弩身”,孙诒让对此疑惑不解,“王说与司马义异,未知孰是”。于氏按曰:“王说是也。”并对此作了充分论证。《庄子》以“机辟”与“网罟”对文,则“辟”非“网”甚明。《释名·释兵》:“弩,怒也,有势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新证》进一步指出:“盖浑言之,则曰弩身;分言之,则弩机之下出可持者为臂也。”以此知此“辟”乃“臂”之借。

(二) 考释原文

按于省吾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考释原文,即考释“昔贤及并世作者所未道及”者。就实际所考释的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求本字

《管子新证》卷四“非斧钺无以畏众”条:于氏认为这里的“畏”应该读作“威”,二字古通。“自下言曰‘畏’,自上言曰‘威’。”并举《明法解》“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为证。

2. 考古字

《墨子新证》卷四“文盆母少四斗”条:按曰:“金文‘毋’字均作‘母’,此犹存古字。”

3. 释虚词

直接考释原文词义的多半为虚词,常引王引之《经传释词》为证。《墨子新证》卷三“而智伯莫为强焉”条:按曰:“为,犹‘与’也。详《经传释词》。”

4. 训名物

(1) 考古器物

《墨子新证》卷一“铸金以为钩”条:按曰:“钩谓带钩。近世出土之晚周带钩习见,其花纹多错金银以为饰。”

(2) 考地理

《管子新证》卷四“战于莒必市里”条:按曰:“‘必’乃‘密’之借字。《春秋·隐·二年》‘纪子帛莒子盟于密’注:‘密,莒邑。’《汉书·地理志》:‘北海郡有密乡。’今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东南十五里有密乡故城。”

(3) 考历史

《吕氏春秋新证》卷二“墨子见荆王”条:《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新证》按曰:“楚惠王即楚王畬章。”

(4) 考物名

《淮南子新证》卷四“而殆于蜚蛆”条:按曰:

“《庄子·齐物论》‘蜚且甘带’释文:‘且字或作蛆。’李云:‘蜚且,虫名也。’《广雅》云:‘蜚公也。’《尔雅》云:‘蒺藜,蜚蛆。’郭注云:‘似蝗大腹长角,能食蛇脑。’”于氏进一步考证曰:“蜚公,今《广雅》作‘吴公。’”另外,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云:“《本草》‘蜚蛆’陶注云:‘一名蜚蛆,其性能制蛇,见大蛇便缘而啖其脑是也。’”由此可见,郭注与陶注相合,二说可并存。

(5) 考时令

《晏子春秋新证》卷一“当腊冰月之间而寒”条:《晏子春秋·第十三·下》亦有“冰月服之”之语,《陈·簋》有“冰月丁亥”之说。接着于氏引吴式芬之说认为“冰月”,就是十一月。

此外,还有考古代人名、考远古称谓等等。《新证》总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文本资料以及古文字、古文物材料,充分挖掘其中的隐含信息,为后世树立了考释之典范。如《管子新证》卷四“出祭王母”条,便是利用古文字材料来推断《尔雅》的成书年代,为进一步考证《尔雅》提供有益信息。于氏认为,金文凡言“王母”,皆谓母也,并引原始材料为证。《伯康簋》中有“用王父王母”之语,《仲虺父簋》中则以“皇考”与“王母”平列,《史伯硕父簋》以“皇考”与“王母”、“泉母”平列,因此,“皇”、“王”乃尊大之称。而《尔雅·释亲》以“父之妣”为“王母”,固知其非周人之作也。

二、校勘类

由于师承及传抄等原因,古籍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字衍脱讹误现象,要想正确释读经史子集,首先需要校勘。正如叶德辉《藏书十约·论校勘》所云:“书不校勘,不如不读。”(转引自白兆麟,2001:17)所谓校勘,“在现代意义上,是指针对一种古籍进行校读勘定,使其复原存真,为阅读或研究提供一个接近原稿的善本”。^{[2] (P3)}校勘与训诂向来互为表里,“校勘是注释的前提,如果原文有脱衍讹错,那么强作注解是不可靠的。”^[3]徐兴海先生在研究《广雅疏证》时,曾深有体会地说:“校讎学是训诂学的基础,训诂是目的的话,校讎即是前提性的工作。”^{[4] (P3)}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校勘伴随训诂而产生,校勘学是广义训诂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清一代,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人虽在古籍校勘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正如于省吾先生在《荀子新证》卷一“然后使壻禄多少厚薄之称”条下所言:“清儒每据上下文句法或类书以改古籍,得失参半矣。”《诸子新证》则在继承传统校勘训诂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屡有收获,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一) 勘误类型

《诸子新证》中涉及版本校勘187例,其中讹误

125例,倒文5例,衍文22例,脱文33例,因宋本避讳而不同的1例,与义亦通者1例。

(二) 校勘结果

1. 讹误类

先列出不同版本,然后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有的还作出进一步的论证。常用的术语有:当从某本、当从之、当据订、当据改、当据正、当作、改某为某非是、较今本为胜、较今本为优、较今本为善、某本与某本颇有出入、作某者是也、作某者为是、应据正、作某者于义为长、与原文不合等。

2. 倒文类

先举不同版本,然后说出自己观点,并作论证。如《管子新证》卷三“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条:尹知章注曰:“谓无新于物事,而物事自变化。”《新证》按曰:“宋本注文‘变化’作‘化变’,当据订。正文先言化后言变,可证。”

3. 衍文类

先列出不同版本,摆明自己的态度,后加以论证。如《荀子新证》“然后隐其所怜所爱”条:于氏认为,“所怜”二字涉旁注而衍,钱氏《考异》谓诸本无“所怜”二字,是也。上文有“如是者,能爱人也”,下文有“唯明主为能爱其所爱”,这里的“所爱”二字与上下文一意相贯,增入“所怜”二字,则骈枝也。

4. 脱文类

先列出不同版本,表明观点,再作进一步的论证和解释。如《淮南子新证》卷三“诚积踰而威加敌人”条:按曰:“唐抄本‘积’下有‘精’字,‘诚积’与‘精踰’相对,当据补。”

于省吾先生在《新证》中遵循实事求是的朴学传统,对那些版本不同而又殊无可据者,则只是列出其异同而不作臆改。如《墨子新证》卷四“令可以救窳穴则遇”条,只指出原仪氏校“救”一作“致”。

(三) 校勘方法

对于校勘方法,前人已作了较为科学的总结,其中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卷六《校法四例》中所归纳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5]尤为学界所称道。于省吾先生在《诸子新证》中所运用的校勘方法总的来说也大体如此。下面从所运用材料的角度探讨一下《新证》在校勘方面的特点。

1. 用本书词句校订

《墨子新证》卷二“与其涂道之修远”条:宝历本“道”下无“之”字,于氏考证了下篇中的“道路辽远”也无“之”字,因而断定“之”当为衍文。

2. 根据文意校订

《管子新证》卷一“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条:尹注曰:“今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于氏按曰:“宋本注文‘今’作‘令’,是也。此言君父令臣子,与‘今’字无涉。”

3. 注文、正文相互参证

(1) 用正文校订注文

《管子新证》卷二“讹言于外者协其君者也”条:尹注曰:“假说妖妄之言以惑众。”于氏按曰:“宋本注文‘以’上有‘外’字,与正文符,当据补。”

(2) 用注文校订正文

《管子新证》卷三“从物而不移”条:尹注曰:“物迁而从之,圣本不移。”于氏按曰:“‘物’下疑夺‘迁’字,注文可证。”接着又进一步解释道,“从物迁而不移,言随物之自迁,而圣人不移。”这与上文的“与时变而不反”正相对为文。

4. 利用古人之语例订正

《老子新证》“鸡犬之声相闻”条:何氏校曰“犬”他本作“狗”。于氏按曰:“作‘狗’者是也。周人载籍恒以‘鸡狗’连称。”接着便举《庄子》、《孟子》、《史记》、《列子》为证,认为《老子》本作“鸡狗”,作“犬”乃后人所易。

5. 根据其他版本校订

《墨子新证》卷三“去而之齐”条:原仪氏校“而”一作“之”,于氏按曰:“嘉靖本、绵眇阁本、堂策槛本、子汇本、宝历本均作‘而’。”

6. 利用古文字材料进行校勘

《墨子新证》卷三“今士之用身”条:嘉靖本“士”作“事”。于氏认为“士”、“事”古字通,金文“卿士”均作“卿事”,即其证。

7. 运用古音知识校勘

《老子新证》“其脆易泮”条:何氏校曰:“祇范本‘泮’作‘判’,余均作‘破’,罗氏《考异》诸本亦作‘破’。”于氏按:“作‘破’者是也。后人不明古音,改‘破’为‘泮’,以韵下句‘其微易散’之‘散’,殊有未当。”古韵“破”歌部,“散”元部,歌、元对转。

8. 用地理、历史等其他知识校订

《庄子新证》卷二“晋魏为脊”条:高山寺卷子本“魏”作“卫”。于氏按:“作‘卫’者是也。……此作‘魏’与下文复,且晋、卫在北,故为‘脊’,韩魏在南,故为‘夹’。”

由此可见,《诸子新证》在校勘方面,不拘于某一种方法,训诂、校勘融为一体,综合运用多种版本、各种材料,言之有理,考之有据,不作穿凿之说,不为虚妄之言。

在古籍整理方面,于省吾先生善于利用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对古籍进行校订和考释,尤其是甲金文等古文字材料的运用,开创了科学整理古籍的一条新途径。包括《诸子新证》在内的一系列训诂著作,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胡朴安先生认为,于省吾先生的训诂、校勘方法有“筌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6] (P354)}于省吾先生也因此被推崇为“新证

派”的代表人物。

参考文献：

- [1] 于省吾. 诸子新证[M]. 大业印刷局, 1940 年, 1962 年中华书局再版, 1999 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
- [2] 白兆麟. 校勘训诂论丛[C].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 [3] 白兆麟. 校勘是释义的前提[A], 文法训诂论集[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7 年.
- [4] 徐兴海. 《广雅疏证》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 [5] 陈 垣. 《校勘学释例》[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年.
- [6] 胡朴安. 中国训诂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1998 年重印.

On the Exegetic Content of Yu Xingwu's *Zhu Zi Xin Zheng*

BAO Shi-lin

(Chinese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Abstract: *Zhu Zi Xin Zheng* is one of the most noteworthy exegetic works written by Yu Xingwu who is regarded as an influential person from the *Xin-zheng School* in Chinese exegesis in the 20th century. It includes ten ancient works such as *Guan Zi*, etc, which were written in pre-Qin ages and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Xin Zheng* mainly examined and corrected 1645 items from the ancient works in which some of the meanings had been hanging in doubt for a very long period. In *Zhu Zi Xin Zheng*, whose content involves textual criticism and collation, Mr Yu used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exegetic versions and materials to prove further evidence with the former conclusions, or to put forth his own points of view, most of which are independent and original thoughts.

Key words: *Zhu Zi Xin Zheng*; exegetic content; textual criticism; collation

(上接第 72 页)

The effect of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Song Dynasty to subsequent literature

CAO Gang-hua ZHANG Mei-hua

(History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Beijing 11 Secondary School 10003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 the effect of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Song Dynasty to subsequent literature from compiling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view. According it, we may know the important status of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Song Dynasty in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Key words: effect;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Song Dynasty